



中国生产气

农村调查史

罗平汉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农村 合作化运动

农村调查史

1953.11

1953.11.11

中国生民气

农村调查史

罗平汉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罗平汉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211-06043-6

I. 中... II. 罗... III. ①农业经济—调查研究—中国
②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中国③农民—问题—调查研究—中国
IV. F32 D42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8767 号

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

ZHONGGUO GONGCHANDANG NONGCUN DIAOCHA SHI

作 者: 罗平汉

责任编辑: 江典辉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jiangdianhui@sina.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00

字 数: 31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6043-6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大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	1
1. 农村调查的最初提出	1
2. 彭湃农村调查与农民运动	10
3. 毛泽东的早期农村调查	15
4.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1
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30
1. 在调查中完善土地革命政策	30
2.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38
3. 红军的调查研究制度	50
4. 特殊条件下的农村调查	57
三、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农村调查	64
1. 农村调查推动整风运动	64
2. 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调查研究	72
3. 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	79
四、农村调查与土改纠偏	93
1. “左”倾错误的出现与发现	93
2. 在调查研究中进一步纠“左”	99
3. 停止新区急性土改	109
五、20世纪50年代几次重要的农村调查	117
1. 新区土改中保存富农经济的调查	117
2. 调整统购统销政策的农村调查	129
3. 一次旨在加快合作化速度的调查	139
4. 公社化前后的两次农村调查	152

六、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全党农村大调查	164
1. 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64
2. 中央调查组对三省农村的调查	172
3. “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181
4. 围绕“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大调查（一）	197
5. 围绕“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大调查（二）	204
6. 为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再调查	214
七、农村调查推进包产到户	228
1. 引起中央重视的两个调查报告	228
2. 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	236
3. 在调查中改变对包产到户的认识	251
4. 农村调查与五个“一号文件”的出台	260
5. 及时反映农村改革发展动态	270
八、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调查	284
1. “农村承包制政策不能变”	284
2. 围绕减轻农民负担的调查	289
3. “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	301
4. 总结农村改革基本经验	310
九、新世纪的农村调查	314
1. 从税费改革到取消农业税	314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318
3. 谱写农村改革发展新篇章	327
后 记	331

一、大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

1. 农村调查的最初提出

对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而言，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开始观察农民和土地问题。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因此，“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为此，他号召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①

次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将生产工具包括土地等“收归社会公有，社会公用”。1920年底刊载于上海《共产党》月刊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公开号召农民“自己动手”，“抢回”自己“靠着吃饭的田地”，并说共产主义者一定支持他们的要求。文章号召说：“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使他们的这种自觉呀！”^②

虽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他们观察中国的视角，放到农民身上，对农民生活困苦寄予无限的同情，但总体来说，当时他们对农民和土地问题的认识，还是零碎和模糊的。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张国焘回忆

^①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6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说，在中共一大前，“我们没有谈到农民，这大概是认为现在还谈不上，再则农民和共产主义实在距离得太远”。^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主张“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为此，应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②这个文件作为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要将农民作为自己重要的社会基础，表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代表着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这里所提到的没收土地，并非是要以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是将土地作为资本家生产资料看待的。

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在呼吁书中把“耕者有其田”与“争取国家的和平与独立”、“工厂属于工人”一起，列为“我们的口号”。同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无产阶级奋斗”的党，有着自己明确的奋斗目标，其中之一便是“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同时要“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③但其中并无实质性的内容。

从总体上讲，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将自己工作的重心放在开展工人运动上，对农民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万事开头难，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没有革命的经验，对中国基本国情还缺乏准确把握，因而对中国革命如何开展认识也还比较肤浅；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问题的论述不够系统、深刻有关。

不过，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深化的。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的时候，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就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9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宣言进而指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制定《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进一步论述了农民问题重要性：“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①

这个文件还分析了农民的痛苦，指出欲解除此等痛苦，应采用下列政策：（一）限田运动，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以内，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二）组织农民消费协社，中国农民间有合资向城市购物之习惯，应就此习惯扩大为消费协社。（三）组织农民借贷机关，中国农村向有宗祠、神社、备荒等公款，应利用此等公款及富农合资组织利息极低的借贷机关。（四）限制租额运动，应在各农村组织佃农协会，每年应缴纳地主之额租，由协会按收成丰歉议定之。（五）开垦荒地，应要求政府在地税中支用款项，供给过剩之贫农开垦官荒。（六）改良水利，应支用国币或地方经费修理或开挖河道，最急要者如黄河、淮河等。此等河道之开浚，不但与农民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而且在工商业之运输上亦有绝大的影响。^②

在此前后，一些党员也发表文章，论及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1922年12月，宣中华在《农民和革命》一文指出：“我们也晓得农民运动没有工人运动那样容易。工人会集一处，而且因都市化的结果，知识都比农民高，胆力都比农民大，举动也比农民灵动，无论施教育、团体，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都比较可能而易达。然我们决不能因农民运动困难而不去运动。”“从大体看来，农民都极安分极耐苦地屈服着，但农民终究不是傻子，不是都没有脑子的”，“如果有人向渠们一招呼，一提醒，则枯草遇火，不论山上的，地上的，田里的，都大大地延烧起来，近风施威，将不能或遏了”。^①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已经初步意识到农民的重要性，一些较为熟悉农村情况的共产党人，开始走上组织农民运动之路。1921年9月，当时是中共党员的沈定一，在其家乡浙江省萧山县衙前地区，领导农民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公开声明与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做出“三折还租”的决议，规定改大斗为公斗（每斗十五市斤）量租；取消地主下乡时要佃农负担的“东脚费”；反对交预租，提出种当年地，交当年租，看年成好坏还租，并宣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11月24日，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宣告成立。但是，这里的农民斗争于当年12月被地主阶级和省县军警所镇压。

1923年四五月间，中共党员刘东轩、谢怀德被派回家乡湖南省衡山县岳北地区，领导成立了岳北农工会，并发动了阻禁米谷出境和减租斗争。到今年11月，登记入册的会员达4万多户，总人口有10万之多，邻近的衡阳、湘潭、湘乡等县边界的农民也纷纷响应。岳北的农民斗争同样很快被地主阶级和反动军队镇压下去。

衙前和岳北的农民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先驱，但就全党而言，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固然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关，但也与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思路不无联系。比如，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张国焘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时代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②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也认为，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

^①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衙前农民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② 张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变化》，载《向导》1922年第12期。

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厉害，因而“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①

这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甚至被称为党内农民问题专家的毛泽东，此时也没有把农民运动当成紧迫的问题。恽代英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农村。后来，他曾多次讲到这个问题。1938年3月21日，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的临别演讲中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②

不过，这种状况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的时候，已经有所改变。这次大会重点是讨论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但农村和农民问题也是大会的一个重要话题。张国焘回忆说：“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按：指农民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③

中共三大通过了一个由谭平山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认为，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品的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革命以后，军阀争夺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布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294页。

运动之必要”。^①

中共三大之后，中共党内对于农民问题逐渐重视起来。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第1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认为农民“在目前已为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不可漠视农民问题”，“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1923年12月，陈独秀写作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承认“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当然，这里陈独秀仍是将农民作为国民革命的“潜势力”来看待的，因而他一方面承认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他还说：“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②

1924年1月，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13期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文章在介绍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后说，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认为地主阶级和官僚军阀的剥削压迫之下，“农民经济破产得不堪言状”，因此“中央当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地方机关应当常常注意地方范围内的农民问题”。^③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6—367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249页。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更是把农民运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①

随着中共对农民问题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农村调查也开始受到重视。1924年3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23期上发表了《湖北黄陂农民生活》的调查报告，对黄陂农民的各阶层及其经济与生活状况，作了细致的调查。调查报告中说，黄陂的田，是以石、斗、升、合为单位而计算的。每石田上好的约可产谷二十石，即是可以碾糙米十石，若碾细米只得九石零。田少的人，有只得田若干升的；中国人分家的风俗，每令后一代平分前一代的田产，所以田少的人很多。这种人专种自己的田不能供给生活，所以每须同时兼佃人家的田，佃的田与自己的田，不必在一处，不过距离总在三四里以内。

中国的佃农生活很苦，必须承受很重的经济剥削。调查报告说，佃田的人，每石田普通完租谷十石于田主，便是等于产谷总额一半左右；亦有少到完租八石或七石的。完租多的，或至十二三石。这种佃谷，是以“每石田几石谷”预先约定的，除了大荒歉以外，田主是不肯减少租谷成数的。在别的地方，有按收成五成对分或四六成分的。黄陂的田主，则不问佃户的收成，他们按一定的石数收租。若要希望他减少租谷，佃户须发轿子把田主接到家中，请他大吃大喝一顿，再引他到田里踏勘，才双方商议减成的办法。

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实际上阻碍生产力发展。对于田主而言，他关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心的只是收入租谷，对于农民生产的情况是全然不关心的，而“佃田的人，因为田地不是他自己的，他在任何时间都有被田主撤换的可能，所以他不甚肯爱惜田地。再则一般农人，多半是愚昧的，他们不知道精意耕耘，田中土块亦每不注意使他散碎；田中杂草，有时便听他自由滋长。因此所以他们每不能尽生产的力”。^①

这篇调查报告还介绍了农村雇工、乞丐、灾民、耕田的本金与利息、借贷、牛价、典当、田赋、养猪、织布、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

随后，中共领导的《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刊物，相继发表一些农村调查报告，仅在《中国青年》上，就发表有俊才的《山东广饶农民生活》、郁青的《河南彰德农民状况》、卓汉的《皖北寿县的农民生活》、刘明佛的《豫南固始县仙庄集的穷人》等农村调查报告。1924年，中共湘区委员会还决定由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发起组织一个农民通讯社，进行农民生活状况调查，交流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

与此同时，这些刊物还发表了若干如何开展农村和农民工作、进行农村调查的文章，号召广大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民当中去，了解农民的疾苦，启发农民的觉悟。

在1924年5月3日的《中国青年》第29期上，恽代英发表《农村运动》一文。他说：“许多现象，是我们以为很平常而人人知道的；然而惊人的道理，都会从对于这种现象能加以注意而产生出来”。但过去由于“未能十分明了农村的真状，所以我们说的话做的事，总未能对于农民抓到痒处”。恽代英认为，以往开展农村运动有两个误点：一是不知道因势利导的道理，不问农民的心理，去做那些做不通的事情；二是不曾审量农民的地位与实力，一味引他们去作反抗的运动，使有些比较怯弱的农民不敢接近。恽代英认为，开展农村运动正确的方法，是首先取得农民的信任，诚心与农民交朋友，办法就是“与农民多接近”，“先使他们亲近你信爱你，你再多从他们考询他们的问题，并与他们商量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②

① 《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7—488页。

② 《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4—525页。

在1924年10月18日的《中国青年》第49期上，发表了署名“新予”的文章《由经验得来的“农村运动的方法”》，总结了开展农民运动的十条办法：（一）到民间去工作，穿民间的衣服，说民间的话，吃民间的饭，每日做民间事一两个小时；（二）清晨比农民起得更早，做事比农民还下劲；（三）与农民谈话先问后答，不直告；（四）要谦逊，并设法亲近他们；（五）在他们面前可说笑话，不与人骂玩话；（六）想说帝国主义、军阀不好，要从农民的痛苦说起；（七）要有替农民解决问题的常识；（八）在农民休息时，多对他们讲有趣的故事和笑话；（九）在农民休息时，把自己会的玩意演给他们，演过后要告诉他们原因；（十）什么样的人给他什么样的应对，令他信服为此。

在1924年11月22日的《中国青年》第54期上，发表了曹谷芸的《怎样和农民谈话?》一文。文章说，与农民谈话要注意农民的心理，但又不能完全迎合他们的心理，而要设法开导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要了解农民的生活实际，否则谈话会隔靴搔痒；如有工夫谈他们的家庭情况，这样会使谈话亲热，并从中找出农民的各种隐痛；还要关心乡村教育，取得农民的欢心，以便作进一步宣传。可见，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问题已日益为共产党人所关注，他们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放到农村问题的观察和农民问题的解决上。

在1925年12月29日的《中国青年》第106期上，发表了署名“其颖”的《调查农村经济状况的大纲》。文中说：农民问题，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占一个重要地位，因为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的经济基础，虽因国际帝国主义之侵而日见崩坏；然而农民群众则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凡是忠心于民族革命的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万无忽视之理。文章进而认为，要动员组织农民参加革命，就应该特别注意农村经济状况的调查，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以便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而规定革命的策略与革命的目的以为普遍之宣传。文章附有《省、县、乡农村经济调查表》一份，要求调查的内容涉及地理上的大概情势、农民的种类及生活状况、生产的种类、农业的副产、生产的方法、农民的组织、农村的教育、农村的风俗习惯、普通农民最低生活限度的标准、农民的一般负担、灾荒的情形、农民的破产情形、农民的心理和要求、农民运动的状况等十四个大目，每一大目下又分若

干需要调查的小目。

2. 彭湃农村调查与农民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和农民运动史上，彭湃是不能不提及的一个人。

彭湃虽然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他树立了爱国民主思想以后，逐渐转变立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他已开始重视农民问题。1919年9月，早稻田大学的部分学生发起成立“建设者同盟”，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成员有很多来自农村，很重视农民问题，强调要从事农民运动，彭湃便是这个组织的积极参加者。

从日本回国后，彭湃立即在广州和家乡海丰县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并在海丰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向工人、农民作《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等讲演。从1922年5月起，彭湃便“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开始农民运动的进行”。^①1922年6月，彭湃在海丰正式开始从事农村调查和进行农民运动，揭开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序幕。

在开展农民运动之初，彭湃的行动并不为农民所信任。经过艰苦努力，彭湃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22年7月29日组织起“六人农会”，10月25日又领导成立有500余名会员的赤山约（约，相当于大乡）农会。随后又成立守望约农会，点燃了农民革命组织化的火种。此后，海丰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到1922年底，入会会员已达2万农户、10万余人，约占海丰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23年1月1日，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总农会，并通过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宣布海丰总农会纲领是“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②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彭湃对外提出了改良农业、增加农民知识、做慈善事业的口号，对内则提出了减租、取消“三下盖”（指地主收租时连续用斗盖在

^①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112页。

^② 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2页。

斗上刮三次，以把谷子压实，达到多收谷子的陋规），取消“伙头鸡”、“伙头鸭”、“伙头钱米”（指地主下乡收租时农民要送鸡鸭钱米或招待的陋规），不给陋规与警察的口号。^① 这些问题，都是农民最迫切要求解决的。为了防止地主夺地、加强农民的团结，他提出“同盟非耕”、“穷人联合”，即地主对农会会员易佃加租时，其他会员不能去耕种，对非会员也加以说服，不予接受。如地主坚持不让原佃户耕种，则所有人都不去耕种，让土地荒芜，从而保障了农民的租佃权，防止了地主的破坏，加强了农民的团结。经过努力，海丰农民的生产、生活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923年2月20日，彭湃撰写了《海丰总农会成立宣言》。《宣言》对农民在社会各阶级中的重要性作了充分肯定，指出：“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人类生命的存在，完全靠我们辛苦造出来的米粒。我们的伟大和神圣，谁敢否认！”《宣言》控诉了农民所受的苦难，公开声明总农会的成立就是为了“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② 1923年5月间，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任会长，海丰、陆丰等地设分会，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7月间，农会组织在普宁、惠来等县有所发展，便将“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担任执行委员长。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有力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农民部，统一领导农民运动，由共产党人林伯渠担任部长，彭湃任秘书。同年4月，彭湃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5月11日，彭湃致信陈独秀，以其亲身调查得知的海丰第三区林姓地主为例，对海丰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进行阐释。信中说：“他们对于佃户异常苛酷，屡屡升租，不遂则收回田地，批与别人。十年前每石种田（每亩田当海丰八升种）纳租额不过五六石，至多亦不过七石。现在每石租田竟升至二十石租之高”，致使农民“收支相抵每

^①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②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